

螳螂自语

汪丁丁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螳螂自语

汪丁丁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螳螂自语/汪丁丁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2

ISBN 7-220-06232-X

I. 螳... II. 汪...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110 号

TANGLANG ZIYU

螳螂自语

汪丁丁 著

特约编辑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游仲伦
袁久勇
张 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 //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开 本

730mm × 988mm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4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232-X/I·927

定 价

35.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编辑部联系调换 (028-86674373)

序及解释

这小册子不是我个人出版计划内的“项目”，它是应朋友之邀从过去十几年里已经发表的全部文章里挑选“精品”而成的文集。我觉得这组文章至少应当满足两个条件：（1）通俗性，最好是完全没有数学符号；（2）面向企业家群体。

这样，我想到要从企业立足和发展的根基——“信誉”谈起，逐渐论及知识社会的企业创新过程和知识社会面临的教育困境。这两个一般性主题的背景则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关于“信誉”的根本重要性，我在过去十几年的旧作里反复论述过，这些论述又反复出现在各种文集里。不论怎样精选，我恐怕也会让熟悉我的文章的读者感到厌倦了。所幸，2002年6月间，我读到一组非常出色的桑塔费（Santa Fe Institute）文献，引发我写了一系列《读书》笔记。当然，等候《读书》这样的杂志——把我的“笔记”发表出来，然后再收录到文集里，大概要等到2003年以后了。而且，《读书》取稿极其苛刻，凡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过的文章一概不纳。这有时很让人尴尬，我记得某年我的某篇文章被某刊物的朋友“提前”发表且“不幸”被《读书》的编辑发现了，为正天下视听，《读书》编辑部全体加班，到印刷厂去硬是把已经排好的版给拆了重排。这小例子，足以说明《读书》编辑的敬业精神。

有了上述的警惕，这组文章的第一篇，既然是为《读

书》写的，就意味着潜在的“首发权”冲突。我由衷希望本书的出版时间不会比《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更早。

收录在这里的另一篇文章，“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很长，是写给《中国大讲堂》文集的。后者，即一群学者在大学课堂上的讲义，是近年兴起的很出色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的市场策划的产物。这一“讲义”系列已经出版到第三辑了，因为销路顺畅，出版的速度很快。所以，我几乎可以肯定“第三辑”出版的时间会在本书之前。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篇文章，其余的文章都是“旧作”，有些已经“旧”到快被遗忘了。颇让我诧异的是，当我从大批旧作里把篇幅最长的前25篇挑选出来阅读的时候，有种几乎“全新”的感觉。这感觉与阅读一大堆较短的“杂文”的感觉完全不同，它的学术味道更强烈，虽然，没有数学符号和理论术语。

这样，我决定彻底抛开“时间”，单纯从“空间”角度编辑这本文集。抛开时间的危险在于读者可能忽略了文章写作的年代，随意切换文字的历史处境，导致“误读”和“误解”。为避免诱发这样的阅读，我在每篇文章后面标明了发表年代。就我个人的“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而言，1990年以前是在图书馆里读书的阶段，1991年~1996年期间是在香港就近观察和研究“企业家精神”的阶段，1997年~2002年期间是转向“社会博弈与知识理论”的阶段。不同的阶段，人们思考不同的主题，并且受这些主题的影响，写

不同风格和侧重点的文章。这是“时间”维度对阅读的影响，这影响表现在文集的题目里，叫做“自语”——作者思想的“自言自语”。

我希望读者在沿“空间”阅读时，时常记着顾盼一下文字的“时间”维度。这样做的好处是，例如，你读到一段多年前写的十分精彩的文字时，不会被它的精彩所迷惑，因为它在“时间”维度上的位置意味着，很可能，它所表达的思想已经被超越了。当然，这一命题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你读到一段很早写的文字，不要因为它思路“混乱”而气愤，因为你明白，那是“思想”难免的过程。只有一种情况是不可原谅的，那就是你读到最近写的一段文字，发现它思路混乱。

我由衷希望这里的文字，没有哪一段落掉进上述的最后那种情况。

记丁

杭州“密云不雨斋”

2002年12月8日

目 录

“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1
回顾 “金融革命”	18
写在历史的边缘	38
知识社会重塑资本市场	50
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	114
再论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154
制度分析基础	169
社会科学及制度经济学概论	185

知识社会与现代教育的双重困境	209
经济制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226
跨国公司与中国转型期社会	230
中国企业家的困惑	258
中国经济的特质	283
中国90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296
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	308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超越	
“交易费用”理论?	314
螳螂自语	318



“信誉” 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现代“时空”现象之一是学者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争夺学术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的速度必须以“星期”甚至以“小时”计算（典型如抢先在《科学》或《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生物基因和基因医学的研究报告），所谓“求快”。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和资料来源的全球化倾向于降低原创性研究的速度，所谓“比慢”。两相权衡，如果学术制度迫使学者参与“不发表便毁灭（publish or perish）”的生存竞争，则“天才”以外，学者们要么陷入“求快”的恶性循环，要么成为学术制度的“边缘人”。例如，在英国剑桥农庄“务闲”十多年的“B. J.”教授便属于后者，务闲的成果是发表了《时间的终结——物理学的下一场革命》。财务上难以独立的学者，学术上也难以独立。看看我们经济学家的日常活动有多少时间是花在为企业“剪彩”这类事情上，就不难判断我们经济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维护经济学的学术独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维迎（在《读书》撰文）批评经济学家不喜欢讲真话了。

毕竟还是有些愿意“比慢”的学者，居然没有赶时髦，没有赶在被“世纪末情结”煽起的出版热潮（1999年、2000年、2001年）里发表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信誉”

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2002年4月，我读到了“比慢”的研究成果之一，《人类文化的黎明——一个大胆解释人类意识进步“大爆炸”的新理论》(Richard G. Klein, *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A Bold New Theory on What Sparked the 'Big Bang' of Human Consciousness*, John Wiley, 2002)。作者克莱因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被《演进人类学》杂志誉为“今天美国最重要的人类学家”。

迟至2001年春季(或许还要等到2008年)，考古学家才最后确认了这样一件事：从非洲猿到现代人的转变，最关键的环节隐藏在这年3月在肯尼亚土耳其卡纳湖西侧350万年前地层里出土的一颗震惊了古人类学界的颅骨化石。按照考古学惯例，该化石所代表的猿人被一位出身考古世家的发掘者(Meave Leakey)以当地语言命名为“肯尼亚的平脸人(Kenyanthropus platyops)”。

可见，脸部是否扁平具有重大的演进人类学含义。克莱因解释说：以果实为主要营养来源的古猿，嘴部多向前方突出，如鸭子一样呈扁平状，为的是尽量多地保存嚼碎的果实。同时，极为突出的嘴允许门齿旁边长出很长的“獠牙”，刚好用来威胁敌人。后来，气候变迁，热带雨林消失，果实日益稀缺，或许是偶然地，一些“四足猿”为求生存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成为“非洲古猿”——更频繁地使用“两足”的猿类。这样，猿的两只“手”比较频繁地呈现出来了。这些有手的猿，仍是出于偶然，发现以石相击，只要角度恰当，就可能打击出“刃”来。2000年发表的考古学成果告诉我们，已知最早的人工造成的“刃”，

是在260万年前。这样，考古学成果告诉我们：地球上先有了石器，其后才有了最早的人类——homo-habilis（“手人”），约出现在200万年前。手人的脸，已经是扁平的了。

嘴的收缩，最初发端于食肉。在没有“刃”的时代，“两足猿”如何撕扯生肉呢？于是有了对粗壮的“智齿”的需求，在粗壮智齿的作用下，脸部骨骼逐渐“直立”，鼻梁也开始“高耸”。伴随着脸部扁平化过程的，对我们人类极其重要的一个演化环节是口腔形状的改变。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信，直立人 (homo-erectus) 之所以能够使用语言，在发生学上与喉结、鼻腔、舌根和口腔的结构密切相关（参阅D. Johanson and B. Edgar, *From Lucy to Language*,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古人类行为学家比较了许多动物的社会行为之后指出，四足猿由于有长脸和獠牙，其社会交往的效率比其他动物更低，不仅因为面部表情“狰狞”，而且獠牙成为大打出“手”的方便武器。对非洲南部大量出土的猿人化石的进一步考察发现，与我们人类的情况完全不同，古四足猿的男性与女性身体尺寸的差异太大。原因是，由于社会交往效率低下，四足猿实行男女分居，发情期间，能够击败其余男猿的男性独占大部分女性。这样，演进的结果，造成猿人的性别尺寸差异极大。这一情形也见于今天猩猩和狒狒的社会。

相比之下，生活在东非的脸部扁平的两足猿的社会生活和谐得多。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上，石器的出现固然极端重要，但从晚近考古发现看，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似乎比石器的出现更加重要。

今天，基因学和考古学的结论都指向同一个人类发源地——东非高原。与人类的直系祖先“两足猿”（分类学名称“Australopithecines”）化石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

“信誉”

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的，还有从南非出土的大批“长脸”古猿化石。自从两亿年前，古代大陆板块分裂为非洲、亚洲、大洋洲以后，新生成的印度洋的巨浪便日夜冲击着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海岸，在沿海峭壁上凿出了大量的岩洞。正是从这些岩洞里，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约300万年前生活在那里的古猿的化石。

晚近的考古工作在开普敦东面700公里印度洋沿岸的一条小河的入海口那里获得了新的进展。小河的名字叫“克莱西斯 (Klasies)”，在这里出土了一群生活在12万年前至6万年前的现代或半现代人类（“智人”）的化石。

其中，芝加哥大学的辛格教授在克莱西斯河口一个古猿岩洞外的峭壁下发现了一批人类骨骼化石。奇怪的是，这批化石所代表的这群人类的年龄结构与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同，即儿童、成年、老年三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保持在1/3左右。这样一个具有“稳定人口”结构的社会突然全体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口，成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疾病造成的死亡人口，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会非常高。因此，战争和疾病遗留下来的尸体化石，其人口结构不应当是“稳定人口”的结构。这样，剩下的最合理的解释便只有一个：这群人类是被另一群人类从峭壁上推下来摔死的。

1998年，伊利诺斯大学香槟校区的考古学教授安布鲁斯 (Stanley Ambrose) 在《考古科学杂志》第25期上发表了一篇从题目看便知其重要性的报告“东非石器时代后期及其食物生产的编年史”。从制度分析角度看，这篇报告描述的最有

意义的现象是这样呈现出来的。作者在东非发掘的上述古猿岩洞之一——由于意义重大，已经以当地语言命名为“Enkapune Ya Muto”，即黑夜与黎明交界处的岩洞，那里出土的几千块化石里包括600多个细微碎片，是从非洲土鸡的蛋壳上剥落的。这些碎片其实是13个直径约6毫米的圆形“古钱”碎裂后的残余化石。当然，这批中央穿孔的小圆片肯定不是“钱”。以东非智人的能力，每片这样的“圆片”需要成年男性打磨几个小时，而且在“成品”附近出土了10倍以上的“废品”和“半成品”，足以想像打磨者们对圆片工艺的要求之高和对圆片的社会需求的数量之大。对于这批“工艺品”的功能，安布鲁斯的判断是：信誉，这群4万年前生活在“黑夜与黎明交界处”的智人已经建立了在精美的礼物——土鸡蛋的蛋壳打磨的小圆片穿成的项链——的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花费几个小时的宝贵劳动打磨一片这样的礼物，安布鲁斯教授说，对于礼物可以维系的社会保障系统来说，是非常合算的。借助于社会网络，早期人类比单独的群体更能够应付高度不确定的环境，甚至冲出非洲。值得注意的是，克莱依斯河口出土的那批化石里，找不到类似黑夜与黎明交界处的“小圆片”。此外，克莱因指出，克莱依斯河口人群的经济活动能力和经济规模也比东非洞穴里的人群小得多。

这些小圆片还意味着：当时东非的人类已经广泛使用“符号”来进行社会交往了。要知道，“符号”只在大脑不仅具有充分的联想力而且具有足够的抽象能力时才可能发生。一旦获得了符号能力，人类就能够创造出艺术、数学和象形文字。克莱因进一步推测：与东非高原居住着的人类相比，南非克莱依斯河口的人类社会不具备符号能力，故这里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局限在狭小河谷的范围

“信誉”

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内。社会交往效率低下所导致的封闭性或许也是一群强者把一群弱者推下峭壁的原因吧？

现在让我们想像自己是150万年前的“两足”的猿人（手人），走在大河旁的凶险丛林里。与那些臂膀修长的“四足猿”相比，我们在行动敏捷和爬树避险方面没有任何优势，我们健壮的胸部和长臂早已退化为“柔弱”的胳膊和手，我们臀部和腿部的肌肉也远不如四足猿那般“敦实”。我们直立的身体带来的几乎惟一的“好处”是发声方面的便利。可是你知道吗？就因为“直立”，女性身体的骨盆变得极端狭小，生孩子变得极端困难，只有那些头颅足够细小的孩子才有机会出生。听老人们讲，我们不够聪明，都是因为骨盆限制了大脑。顺便告诉你吧，别看我们手臂柔弱，可我们手里有十分锋利的石刃。此外，“手”带给我们的最大和真实的好处是让我们可以“钻木取火”。那是10万年前的事儿了。听老人们讲，当年最宝贵的东西是火种，因为当时懂得“取火”的人还很少，如果那个懂得取火的人突然死了，那么剩下来的“火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种子。在山洞里生活，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取火的人已死而火种又突然湮灭。要知道，我们的牙齿和肠胃早已不习惯吃生肉了，生肉会让我们拉肚子的。况且，高原太冷，从海那边吹来的风随时可以让我们统统感冒死去。唉！据说最南边的四足猿生活得相当惬意，那里气候也暖和得多啦。不过我们这辈子是回不去了，据说我们祖上当初就是从那边被最凶悍的四足猿驱赶到这里来的。谁叫我们是软弱的两足猿来着呢？

软弱的两足猿生存下来了，由他们首创的基于语言交往和旨在促进合作的社会关系——包括用土鸡蛋壳精心打磨的小圆片串起来的项链，让他们的后代获得了在地球各个角落生存和发展的伟大能力。克莱因在这本书里打算告诉我们，20世纪末最后几年的考古发现证实：我们人类的祖先，“两足猿”，从600万年前到250万年前，始终生活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的狭小区域里。两足猿的脑容量在如此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与它的近亲“猩猩”和“狒狒”类似，没有任何增长。大约250万年前，由于打造石器，两足猿的脑容量终于突破了500立方厘米的均衡限制。于是，200万年前，猿人第一次走出东非高原，在各个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后代，那些后代又演变出各自的种群。关键的一跃发生在60万年前，那期间人类的脑容量明显增大，从900立方厘米以下突然扩张到1200立方厘米以上。这意味着大脑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完成的社会交往的任务在规模上有了突然的扩张。最后，大约在5万年前，走出东非高原的“智人 (homo-sapiens)”在整个欧洲大陆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前者或许还继承了后者的高度发达的艺术与宗教传统。此后，人类文化演变的速度，大约从4万年前开始，也突然有了“加速度”，每次技术革命之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从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进而跃变到几十年和几年。今天的“互联网革命”隶属于20世纪50年代的“微电子”技术革命浪潮，但全球时空的“互联网压缩”无疑孕育着更短促的创新周期。

60万年前的基因突变，不论它蕴涵着多么富于革命性的变革，如果没有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重大改变作为基础，它不仅难以独立对人类演进史发生如此重大作用，甚至可以肯定，它会在缓慢的社会演变中湮灭得无影无踪。因为，我们都知道，物种的基因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

“信誉”

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遗传变异”，而“革命”却远非每日每时都可以发生。克莱依斯河口的人类头颅，虽然完全是现代人的样子，但由于社会行为的演进大大滞后于东非的人类社会，最终也未能走出那条河谷。事实上，克莱因指出，至少在过去的5万年里，人类的解剖学特征没有发生过显著变化。所以，过去5万年的人类进步与基因突变无关，它是文明的内在规律和驱动力量不断演进的结果。

另一方面，只有基因发生突变，脑容量从500立方厘米扩张到1400立方厘米，原本就受到高度挤压的大脑皮层才得以生长出足够多的神经元，从这些神经元的复杂连接中才得以凸现“符号”能力(参见Terrence Deacon,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Penguin Press, 1997)。

自然力和社会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使物种演化路径变得九曲三折，经常陷入死胡同。有鉴于此，推崇“新进化论”的学者们的看法是：那些关键性的进步几乎总是以“突变”方式完成的，在两次突变之间，则是漫长的稳态时期。也因此，出土文物的链条上时常出现“空白”，让考古学家们苦心寻找那些原本就不存在的进步环节。

那么，我们人类经历了多少次突变呢？克莱因的回答是：四次——第一次发生在250万年前，两足的猿突然发现了石头相击可以有“刃”；第二次发生在170万年前，从猿的种群里出现了“手人”，后者具备现代人的体型；第三次发生在60万年前，人类的脑容量和石器的精细程度，同时有了明显改善；第四次发生在5万年前，也是今

天最富争议的突变——基于“文化”发展的脑神经系统突然变得高度复杂起来。

文化之前，先有社会交往。在经济手段极端稀缺的生存环境里，社会交往的规模取决于社会交往的效率。社会交往的效率，十分偶然地，被自然力和社会力制约着，在4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这段漫长历史中，与脸的扁平程度密切相关了。

大致而言，现代人祖先的多重谱系如下：智人，15万年前；直立人，70万年前；手人（又译“曙人”），160万年前；大嘴巴和扁平脸的惊讶人（Garhi），250万年前；大嘴巴的非洲猿人（Afarensis），350万年前。而肯尼亚的平脸人（Platyops）虽然生活在330万年前，却具有比惊讶人小得多的嘴和獠牙，这使他们显得额外“现代”（参见图1）。不幸的是，克莱因的“世系表”显示，或许太早熟难以生存，或许太文明反遭侵略，肯尼亚的平脸人在经历了四个“朝代”（africanus、aethiopicus、boisei、robustus）之后，从地球上灭绝了。其中第四朝的“贵族”，平脸人“罗百氏”，气度委实不凡，鼻梁高耸，嘴巴收进，眉脊突出。罗百氏白齿粗壮，獠牙已经完全消失。根据晚近考古的结论，现代人100万年前在非洲的兴起导致了罗百氏的灭绝。我们人类所属的“Homo”种群，大约是惊讶人的后裔，也就是说，我们祖先的大嘴巴（四足猿的特征）和扁平脸（两足猿的特征）让我们能够应付四足猿和两足猿各自遇到的生存困境。换句话说，“惊讶人”由于具备双重特征而侥幸适应了200万年前非洲气候的变迁。

2001年冬季，在肯尼亚北部的图根山从事发掘工作的法国考古队宣称找到了600万年前13块古猿化石。按照图根语，这些化石被命名为“图根的始人（Orrorin Tugenensis）”。进入夏天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和美国联合考古队

“信誉”

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
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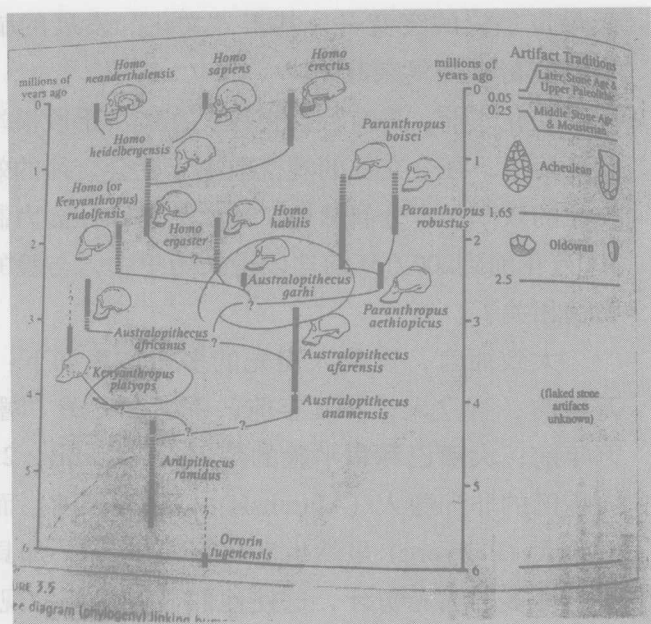


图 1

又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斯河谷里发现了更多的、出自580万年前土层和520万年前土层的“始人”化石。所有这些“始人”化石，都没有显示出“两足猿”的特征。

稍早些年，1994年11月，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海爾·塞拉西曾经在阿瓦斯河谷中部发掘出上百块古猿化石，并且，他在1995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报告里把这些440万年前的古猿命名为“根人 (*Australopithecus Ramidus*)”。注意，这一名称的前半部表明根人是两足猿。

根人化石的解剖学特征介乎于普通猿和两足猿之间，他们仍然有强壮的上肢，仍然有巨大的獠牙和小得多的臼齿，他们甚至有爬树时专门用来锁住手腕的特殊关节。尽管如此，根人的头，